

从“并存”到“共生”：老龄化背景下乡村三元媒介体系的适老化协同路径

张紫玉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9日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技术加速下沉的双重背景下，乡村老年群体在多元媒介格局中的信息弱势地位日益凸显。当前乡村已形成以大喇叭、智能手机、微信群为核心的三元媒介体系，三者功能分化显著，分别适配政策传播、个体化服务与公共沟通需求。然而，这一“并存”格局并非有机整合，老年群体面临着数字鸿沟、信息隔离与代际断裂等困境。本文从场景适配、内容互构、关系勾连三个层面分析适老化传播与代际融合的媒介协同路径，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老年友好型乡村传播体系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乡村老年群体，乡村三元媒介体系，适老化协同路径

From “Coexistence” to “Symbiosis”: The Age-Friendly Collaborative Path of the Rural Triple-Media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Aging

Ziyu Zha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pril 17, 2026; accepted: July 21, 2026; published: July 29,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accelerated penetration of digital

文章引用：张紫玉. 从“并存”到“共生”：老龄化背景下乡村三元媒介体系的适老化协同路径[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481-487. DOI: 10.12677/ar.2026.137482

technologies, the information disadvantaged position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in the pluralistic media landscap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t present, rural areas have formed a triple-media system centered on loudspeakers, smartphones, and WeChat groups, with distinct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respectively adapting to policy dissemination,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needs. However, this pattern of “coexistence” lacks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the elderly population faces dilemmas such as the digital divide, information isol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fragment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dia collaboration path of age-friendly communi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ntext adaptation, content co-construction, and relational articul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building an age-friendly rural communication system.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Rural Elderly Groups, Rural Triple-Media System, Age-Friendly Collaborative Pat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双重浪潮的历史性交汇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村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 23.81%, 远高于城镇, 且老龄化速度更快、程度更深, 呈现显著的“城乡倒置”特征[1]。与此同时, “数字乡村”战略加速推进, 《2025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提出, 到 2025 年底全国行政村 5G 通达率将超过 90% [2]。

智能手机、微信群等新媒介逐步下沉, 与传统的村中大喇叭形成三元并存的媒介格局。然而, 技术的普惠性愿景尚未落地, 农村老年群体因身体机能下降、数字素养不足、社会支持弱化, 正面临被信息体系边缘化的风险。第 5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我国 60 岁及以上“银发”网民规模约 1.73 亿, 但仍有约 1.15 亿老年人未能搭上数字化快车[3]。即使是已上网的“银发网民”, 也普遍遭遇技术恐惧、信息过载、网络诈骗等困扰[4]。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老年数字鸿沟的类型学描述, 或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对立中探讨数字包容策略, 却相对忽视了乡村社会应对技术冲击的内生韧性。基于此, 本文利用三元媒介分类框架, 结合老龄化视角进行本土化界定: 以大喇叭为代表的内生型媒介、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外源型媒介和以微信群为代表的移动新媒介。核心研究问题是: 在三元媒介并存格局中, 老年群体面临哪些适应性风险? 当前并存格局下存在哪些深层张力与治理困境? 如何推动三元媒介从“物理并存”走向“代际共生”, 构建适老化协同路径?

为更具体地呈现上述问题, 本文选取华北地区一个具有典型“流动-留守”二元结构的城郊村庄(以下简称 A 村)作为实证参考。该村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 40%, 青壮年外流严重。在媒介接触方面, 该村大喇叭实现全覆盖, 智能手机普及率达 82%, 建有 1 个村民微信群, 核心群覆盖约 90% 的村民。笔者于 2025 年 6 月~8 月对该村进行了持续跟踪调研, 收集了关于三元媒介使用的一手资料。

核心概念界定

“共生”(symbiosis)概念源于生物学, 指不同物种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互利共存的生存状态。社会

学家胡守钧将共生引入社会系统分析,强调多元主体或要素之间在差异中寻求互补、在竞合中达成平衡的动态过程[5]。在乡村传播领域,媒介“共生”并非简单的功能叠加,而是指大喇叭、智能手机、微信群三类媒介在承认各自技术属性与社会适应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功能互补、内容互嵌与关系互构,形成一种非替代性的、可持续的动态平衡系统。其核心机制包括:功能分化基础上的精准对接、信息流动中的双向转化,以及行动网络中的虚实联动。“共生”的表征则体现为:老年群体不再被单一媒介排斥,公共信息实现代际无差别覆盖,乡村共同体的沟通韧性显著增强。

与之相对,“并存”仅指媒介在物理空间上的共在,缺乏功能协调与意义整合,这正是当前乡村三元媒介体系的基本状态。

2. 老年群体在乡村三元媒介体系中的边缘化与代际分化

2.1. 内生型媒介(大喇叭): 老年群体的“最后依赖”与信息单一化

大喇叭在乡村内生型媒介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信息传播方式兼具潜在强制性与伴随性,可有效触达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是确保政策传播“最后一公里”的不可或缺的载体[6]。同时,大喇叭依托其在地化传播的高覆盖率与高效率,可于短时间内促成普遍的社会共识[7]。在人口老龄化、空心化的村庄,乡村大喇叭在紧急通知、政策宣传、应急预案等场景中发挥着“兜底保障”功能,这种能够“被动接收”“无需操作”的传播方式,恰恰构成了老年群体的“最后依赖”。

然而,大喇叭的信息传播具有明显的单一化与粗放化特征。A村的大喇叭使用集中在三类场景:政策通知、群众动员和应急预案。一般广播内容多为上级政策的简单转述,缺乏针对老年群体的精细化解读;另外,广播时段固定,无法满足个体化查询需求;且过度使用易引发“听觉疲劳”,降低传播效果。更为关键的是,大喇叭作为单向传播媒介,无法承载复杂的操作指南,如医保缴费流程、APP使用步骤等。一位73岁的村民表示“大喇叭一响,知道是村里有重要通知,但具体怎么操作还是不明白。”这反映了大喇叭在信息深度与服务精度上存在天然短板。

2.2. 外源型媒介(智能手机): 数字门槛与适老化不足

智能手机作为外源型媒介的核心载体,为乡村老年群体提供了与外部世界连接的窗口——通过微信视频维系代际情感、通过短视频平台获取娱乐与资讯、通过政务APP办理个体化事务。正如向青平所言,智能手机与各类数字平台的结合,为乡村个体化事务处理提供了便捷渠道,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沟通模式[8]。

然而,数字红利虽惠及农村老年群体,同时也面临着数字接入、使用、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功能性障碍,整体依然处于数字弱势地位[9]。在接入层面,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虽已大幅改善,但智能手机购置费用、流量资费对低收入老人仍构成经济压力。在使用层面,智能终端普遍存在操作界面复杂、字体图标过小、广告干扰频繁等适老化设计缺陷[10]。数字包容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数字技术能否识别并调动乡村社会的内在基础[11]。《适老化APP消费者监督评测项目研究报告》显示,在测评的APP中,仅有21.2%的APP开发了老年专属版本,大量应用在二级界面后恢复标准版,老年人难以独立完成社保认证、线上挂号等操作[12]。在知识层面,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缺乏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技能,信息检索与真伪辨别能力薄弱,极易陷入“数字陷阱”或“信息茧房”。对A村的调研显示,仅45%的老年人能使用智能手机的基本功能,但也仅限于接打电话、刷刷抖音。村民李某(68岁)反映:“我手机上就打电话、刷视频,别的都不会,也不敢乱点。”

2.3. 移动新媒介(微信群): 代际沟通的桥梁与信息隔离的围墙

微信群作为移动新媒介的典型形态,将“人地分离”的村民在云端重新聚集,构筑起内外勾连的“半

虚拟社区”。对老年群体而言，微信群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它成为子女与留守父母日常联系的情感纽带，家庭群内的语音、视频通话极大地缓解了代际分离带来的孤独感；另一方面，村务微信群也成为老年人获取公共信息、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渠道。

然而，微信群的使用同样存在显著的代际鸿沟。60岁以上老人中，能够熟练使用微信的比例不足20%，且多数仅限于接收语音、浏览朋友圈，难以参与群内文字讨论、文件分享、小程序填报等复杂互动。当村委会将医保缴费通知、村务公开信息优先发布于微信群时，数字弱势老人便被排除在信息圈层之外，形成“线上热闹、线下沉默”的治理盲区。

此外，微信群内的信息过载与话语权失衡也加剧了老年群体的边缘感。年轻村民在群内主导议题设置、使用网络流行语与表情包，而老年人的发言往往被忽略或被视为“落伍”。这种现象使老年群体在虚拟公共空间中丧失话语权，进一步强化了代际文化隔阂[4]。

3. 老龄化视角下的媒介治理困境：数字鸿沟、信息隔离与代际断裂

3.1. 代际数字鸿沟与治理“死角”

三元媒介的物理并存并未实现信息的全人群覆盖，反而因代际数字技能差异催生了明显的治理“死角”。陈洪友提出的“后喻结构”概念，深刻揭示了新媒体时代乡村代际之间数字技能的不平等现象[13]。

农村老年群体主要依赖大喇叭获取信息，而大喇叭的间歇性广播无法覆盖所有村务细节，例如社保缴费截止日期、补贴申请材料清单等；微信群虽能传递精细化信息，却将数字弱势老人排除在外；智能手机的个性化操作特性又使老年群体难以独立完成在线事务处理。三者之间的功能脱节导致部分老年村民无法及时获取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服务信息，乡村治理的公平性面临挑战。

这一问题在偏远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农村养老资源供给不足、基础设施滞后，叠加人口空心化，使留守老人陷入“信息孤岛”与“服务荒漠”的双重困境[14]。当数字化服务成为公共服务的“默认选项”而缺乏替代性通道时，老年群体便被结构性排斥在治理体系之外，其养老保障权、社会参与权、发展权均受到隐性剥夺[9]。

3.2. 信息过载与权威消解

现代媒介的普及会导致乡村公共空间萎缩与传统权威消解[15]。村民微信群中，除了村干部发布的村务信息外，村民们还会转发广告、短视频、养生知识甚至谣言传闻等。老年人由于信息辨别能力较弱，容易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与受害者。农村老年群体常遭遇“数字欺骗”与“数字陷阱”，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更侵蚀了对数字生态的基本信任[4]。

与此同时，微信群等新媒介的普及导致信息传播呈现碎片化、情绪化特征，传统大喇叭所代表的官方话语权面临消解。当村民在群内公开批评村委会决策、传播未经证实的负面消息时，基层政权的治理权威受到挑战。不同的传媒会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重塑了乡村话语体系[16]。这种话语体系的冲突，本质上是传统单向传播与现代多元互动之间的张力在乡村社会的投射。

3.3. 虚拟连接与在地行动的“脱节”

微信群等移动新媒介虽能实现“脱域”的云端连接，但这种连接往往停留在情感与信息层面，难以有效转化为在地的集体行动。留守老人通过实体空间流动，如赶集、走亲访友、陪读等活动重建社会网络与地方认同[17]。而虚拟连接若缺乏实体场景的支撑，反而可能导致“线上热烈、线下冷淡”的知行分离。

这种脱节现象反映了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弱化：人口流动使得外出群体的利益与家乡关联性降低，留

守老人则因体力有限、参与渠道单一而难以承担集体行动。三元媒介体系在促进公共事务参与方面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的内聚力面临挑战。

4. 走向代际共生的媒介协同路径：适老化传播与代际融合

4.1. 场景适配：构建适老化的媒介协同矩阵

不同媒介形态的组合可以平衡乡村治理主体的力量分配[14]。根据不同传播场景与老年群体的信息接收能力，明确三元媒介的主辅功能定位，实现优势互补[16]。

在政策传播场景中，应建立“大喇叭 + 微信群 + 上门通知”的组合模式。对于强制性、普适性且时效性强的政策，如灾害预警、禁燃禁放，以大喇叭为主媒介，发挥其覆盖广、强制性的优势，采用方言播报、反复强调的方式确保老年群体知晓；对于精细化、操作性的政策，如医保缴费流程、补贴申请指南，以微信群为主媒介发布图文详解，同时由村干部或志愿者通过电话、上门走访等方式对数字弱势老人进行“一对一”补充通知。这种分层传播策略可有效弥合“接入沟”与“使用沟”。A村在交医保的过程中，采用组合传播模式，大喇叭通知，手机打电话通知到个人，微信群转发操作过程，大大提高了政策覆盖面和有效性。

在公共事务协商场景中，应推动“线上讨论 + 线下会议”的有机融合。微信群可作为议题征集、意见收集的平台，但重大决策仍需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老年协会座谈等线下形式进行充分协商，确保不熟悉数字技术的老人也能表达诉求。同时，可利用大喇叭对协商结果进行广播通报，扩大知晓范围。

在适老化服务场景中，借鉴王金营、朱骏惠(2024)提出的“网格化 + 互助性”养老模式，将媒介协同嵌入社区日常服务[14]。例如，通过微信群发布助餐、助医、助洁等便民信息，由村干部或邻里志愿者代为操作智能手机完成预约。

4.2. 内容互构：激活地方性文化与适老话语

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渠道，更取决于内容是否契合老年群体的认知习惯与生活经验。为此，需推动三元媒介的内容互构，将官方政策语言转化为老年群体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地方性知识”[18]。

一是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增强传播亲和力。大喇叭广播可采用方言播报、案例讲解等形式，将政策内容融入老年群体熟悉的叙事框架。二是推动数字内容的适老化改造。应优化老年人经常使用的平台，使老年人更真切地感受到新技术的实际效用与操作便捷性[19]。村级微信群应照顾老年人的感受，发布语音版通知、大字号图文指南，避免纯文字、长文件等不友好的信息格式。同时，鼓励老年人创作与乡村生活相关的短视频、图片，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传播，增强老年群体的数字参与感。三是加强对微信群信息的管理。针对微信群内泛滥的虚假信息，村委会应设立“信息核实员”岗位，由熟悉网络的年轻村干部或志愿者定期巡查，对可疑信息及时辟谣并发布权威解释。同时，通过大喇叭和微信群开展定期的数字素养教育，帮助老年人识别常见的网络诈骗手法，降低老年人上当受骗的风险。

4.3. 关系勾连：重建家庭 - 社群 - 技术互嵌的共同体意识

媒介协同的最终目标是重建乡村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使老年群体从信息接收的“边缘者”转变为情感与行动的“参与者”。这需要充分发挥家庭、社群与技术的互动关系。

第一，强化家庭场域的数字反哺与情感联结。应鼓励外出子女通过微信视频、家庭群分享等方式与留守老人保持日常沟通，并在返乡期间手把手教授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村委会可定期举办“家庭数字日”活动，邀请年轻人带父母参与智能手机培训，将技术学习转化为家庭互动的仪式。

第二，激活社群层面的互助网络。可依托老年协会、妇女之家等组织，建立“邻里数字互助小组”，

由相对年轻的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操作智能设备、解读微信群信息。面对面的互助能够有效缓解技术焦虑,形成“以老助老”的良性循环。

第三,推动虚拟连接向在地行动转化。微信群不应止于信息发布,更应成为动员集体行动的平台。让老年群体在实体空间中的“在场”与“参与”中重拾对村庄事务的归属感。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意愿较高,《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显示,农村60岁以上人口中约24.5%仍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20]。应通过适老化技术赋能,使老年人以经营者而非单纯劳动者的身份参与农业生产与社区服务,这同样是共同体意识重建的重要途径。

5. 结论

本文从老龄化视角考察乡村三元媒介体系(大喇叭、智能手机、微信群)的功能分化、治理困境及适老化协同路径,并以华北地区具有典型“流动-留守”特征的A村为实证参照。研究发现,当前三元媒介呈现“物理并存、功能割裂”特征。大喇叭是老年群体的“最后依赖”但信息单一;智能手机提供外部连接却适老化不足;微信群发挥桥梁作用但信息过载与话语权失衡加剧老年边缘感。三类媒介缺乏面向老龄化的协同机制。

并且,老年群体面临着数字鸿沟加剧、信息过载消解权威、虚拟连接与在地行动脱节三大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本文提出“场景适配-内容互构-关系勾连”的协同路径:场景适配明确各媒介在不同传播情境下的主辅功能;内容互构将官方政策语言转化为老年群体易于理解的地方性知识与适老话语;关系勾连强化家庭数字反哺、社群互助网络与虚拟-实体行动转化,重建共同体意识。

本研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老年友好型乡村传播体系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但本研究仍然存在局限性:结论的普适性尚需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村中进行实证检验。未来可进一步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如何动态影响老年群体的信息适应过程,以及家庭结构变迁对社会缓冲机制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EB/OL]. https://www.gov.cn/guoch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 2021-05-11.
- [2]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EB/OL]. 2025-02-10. https://www.cac.gov.cn/2025-05/13/c_1748846147356189.htm, 2026-05-06.
-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6-02-05. <https://www.cnnic.cn/n4/2026/0304/c88-11549.html>, 2026-05-06.
- [4] 任世辉. 技术冲击与社会缓冲:农村老年群体数字适应的微观机制及整合性框架——一项界面民族志研究[J/OL]. 电子政务: 1-12. <https://link.cnki.net/urlid/11.5181.TP.20260123.0034.004>, 2026-04-14.
- [5] 胡守钧. 社会共生论[J]. 社会科学论坛, 2001(1): 20-23.
- [6] 张雪霖. 媒介融合背景下乡村“大喇叭”的重建及其机制研究[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1, 74(2): 87-97.
- [7] 齐一放, 张友臣. 大喇叭与疫情防控:乡村媒介与声音媒介的双重在场[J]. 贵州民族研究, 2021, 42(5): 89-96.
- [8] 向青平. 乡村社会混合沟通治理:基于村干部的媒介化实践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5, 32(5): 113-125+128.
- [9] 徐京波, 徐文博.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老年群体数字失能及治理路径[J]. 重庆社会科学, 2024(11): 75-86.
- [10] 王金营, 朱骏惠.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适老化:基础设施与社会人文[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1(5): 91-99.
- [11] 张一晗. 技术适应性:农村老年群体数字包容的实现逻辑[J]. 中国农村经济, 2026(4): 48-68.
- [12] 中国消费者协会. 适老化APP消费监督评测项目研究报告[EB/OL]. 2022-12-08. <https://cca.org.cn/single/11187/48177.html>, 2026-05-06.
- [13] 陈洪友. 从差序格局到新媒介框架——我国乡村传播结构转型的考察[J]. 编辑之友, 2020(9): 43-48.

-
- [14] 都阳, 崔慧敏. 农村人口老龄化: 趋势、挑战与应对策略[J]. 中国农村观察, 2025(4): 3-17.
- [15] 罗士洞. 费孝通眼中的“电视”与乡村研究中的媒介[J]. 民族艺术, 2020(6): 126-134.
- [16] 李乐. 媒介变革视野中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0, 27(9): 78-94+127.
- [17] 夏美丽, 林煦丹. 转型期农村留守老人的空间流动和主体性重构——以湖南省安化县蚩尤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26, 46(7): 1708-1718.
- [18] 陈接峰. 协商式自治: 数字时代乡村治理的媒介化重构[J]. 编辑之友, 2025(8): 60-71.
- [19] 李佳棋, 邵晓枫, 刘文怡.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理论的老年智慧学习路径研究[J]. 成人教育, 2025, 45(9): 33-39.
- [20]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 财政部, 中国老龄协会,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EB/OL]. <http://www.crca.cn/images/20241017wdsjgb.pdf>, 2026-04-16.